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 再檢視*

左正東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摘要

長久以來，經濟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典範，但是，相對於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經濟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研究始終相當有限。為彌補此一學科發展的缺漏，並延續近來學者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重新關注，本文重新檢視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發現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為實現經濟自主，既未必與自由開放相互對立，更可包容諸多政策選項，其核心乃為追求民族建立的意識形態對經濟政策的指導。本文同時發現，作為一種研究途徑，經濟民族主義有兩種可能的研究途徑，分別是實證主義的因果關係研究途徑和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途徑。藉由對此二方面文獻的檢討，本文提出包含對象、工具、和分配三個次級問題的整合性研究架構。

關鍵詞

經濟民族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典範、意識形態

壹、前言

從史翠菊(Susan Strange)提出「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的相互忽略」(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一文以來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發展至今已超過 40 年。不可否認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早期經濟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典範辯論，以及後來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兩者的相互較勁，對於學科的問題意識與理論建構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其實，三大典範的說法本是為了要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外，從民族主義和國家權力的角度另立典範。即便後來的美英兩派辯論，也不敢抹煞經濟民族主義獨立存在的價值。然而，長期以來，以經濟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研究卻相當有限，不但理論內涵早已模糊不清，其在典範辯論之中被期待能發揮引領提出問題和建構理論的功能，更是完全消失。事實上，隨著 90 年代全球化的快速擴張，為了在經濟整合過程保護國民經濟的獨立存在和永續發展，經濟民族主義再度引起學者的關注。尤其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雖然美國及歐洲乃至亞洲各國紛紛採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紓緩危機，但一夕之間的經濟震盪仍難以避免引發各國民族主義浪潮，並帶動不少歐洲國家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措施²，正可說明研究經濟民族的重要性³。本文為補充此一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上的

* 本文研究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計畫編號為(98-2410-H-002-063-MY2)。

¹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April 1970), pp. 304-315.

² Kristian Kurki, eds. *The Great Regression: Financial Crisis in an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Helsinki: Fi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p.22.

³ 雖然，此處本文將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採取的政策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措施，但此為大眾傳媒和一般研究文獻對這類政策的稱呼。根據本文後面的分析，這類政策能否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端視是否為民族主義思潮所催生，並以民族建立

重大缺漏，也延續近來學者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關注，重新檢視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並嘗試提出適當的研究架構，以探索作為三大典範之一的經濟民族主義，是否有可能發展和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量齊觀的經驗研究。下二節本文介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建立及其流變，並在此背景上，介紹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內涵及其所於彰顯之意識形態在對外經濟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則以此提出整合性的分析架構。

貳、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建立⁴

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存在三個典範，最早出於吉爾平(Robert Gilpin)於1972年在「國際組織」期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文章「跨國經濟關係的政治邏輯」(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在這篇文章之中，Gilpin認為經濟與技術力量所創造的跨國經濟雖然是當時(70年代)炙手可熱的新興現象，但其與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政治效忠單位之間的衝突，究竟何者居於主導地位的辯論，實為19世紀古典自由派(Classical Liberal)之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德國歷史學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兩者辯論的延續⁵。誠如Gilpin所說，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和反抗古典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皆從市場經濟或生產模式的需要，來看待政治單位組

和民族生存為其目標。

⁴ 本文第二、三節重要觀點曾發表於作者與楊道昀先生共同發表之會議論文，詳見左正東、楊道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與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合辦，2008年5月1日）

⁵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9.

成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與此相反的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或現實主義學派(realist school)認為權力、安全、和民族情感(national sentiment)，才是國際關係和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⁶。同時，Gilpin 認為，當時蓬勃發展的跨國經濟關係是附著於一套特定的政治利益與政治關係，當此一政治安排發生改變，跨國經濟關係也會隨之改變。這點可證諸於 19 世紀世界經濟和大英帝國的共生關係，以及 20 世紀中葉以後世界經濟和美國所領導之反共聯盟的共生關係⁷。然而，在這篇文章之中，Gilpin 並未正式命名後來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學派，只稱之為民族主義者或現實主義學派。而且，Gilpin 也只是間接陳述基於市場邏輯和政治效忠孰居主導的辯論，存在三種可能的觀點，並未直接表明其和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關連性。直到三年之後的國際組織期刊另一期專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典範才有了明確的界定。

在 1975 年的這份專刊中，Gilpin⁸首次明確地表示政治經濟學存在三種流行思潮(prevaling school of thought)或觀點(perspective)，分別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和「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在這三種思潮的基礎之上，Gilpin 提出了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三種模式，分別是「主權擱置模式」(Sovereignty-at-bay Model)、「依賴發展模式」(Dependencia Model)、和「重商主義模式」(Mercantilism Model)，這三種模式可以看作為三種理想型(ideal type)，對於官方、學術界、乃至一般大眾如何看待貿易、貨幣、和投資問題，帶來深刻的影響⁹。換句話說，Gilpin 所提出的三種流行思潮，不但有其理

⁶ *Ibid.*, pp. 51-52.

⁷ *Ibid.*, p. 63.

⁸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⁹ Robert Gilpin,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論假設與分析邏輯，而且預設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並構成菁英與大眾對於世界經濟問題的想像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其後，Gilpin 在其所著之「美國權力與跨國公司(US Powe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一書，進一步闡釋此三種流行思潮的分野，在於對五個政治經濟的基本問題提出不同的答案，這五大問題分別是「經濟關係的本質」、「行為者的本質」、「經濟活動的目標」、「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改變的理論」¹⁰。

然而，Gilpin 不是同等看待這三種思潮。當 Gilpin 撰寫「跨國經濟關係的政治邏輯」一文時，這篇文章原是為「跨國關係和世界政治」專刊所準備，該期專刊由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奈伊(Joseph Nye)所發起，這是因為兩人於 1968 年加入國際組織期刊編輯委員會後，希望扭轉研究國際組織的珠穆朗瑪峰現象(Everest Syndrome)¹¹，從世界政治的互動形式(pattern of inte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入手，來看國際組織所扮演或應扮演的角色。而跨國關係的研究，絕非始自於 Keohane 與 Nye，在兩人之前的艾隆(Raymond Aron)、傑賽普(Philip Jessup)、凱瑟爾(Karl Kaiser)、曼德豪森(Horst Menderhausen)、和羅森諾(James Rosenau)都曾

1(Winter 1975), pp. 38-39.

¹⁰ 自由主義認為經濟關係的本質是和諧的(harmonious)，馬克思主義和重商主義則認為是衝突的。自由主義視家戶和公司為主要行為者，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經濟階級，重商主義則認為是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活動的目標是極大化全球福祉、馬克思主義認為是階級利益的極大化、而重商主義則認為是國家利益的極大化。有關經濟與政治的關係，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應該決定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而重商主義則認為政治決定經濟。最後，自由主義視現存秩序為理所當然，改變僅有可能是在動態均衡過程中的漸近適應，重商主義則認為改變唯有在權力平衡變化時才有可能發生，兩者都沒有提出關於改變的完整而具系統性的解釋。相反的，馬克思主義對於改變則有非常清楚的看法，認為生產工具的改變及其後所帶來的階級利益衝突，將造成不均衡的傾向進而帶來政治社會體系天翻地覆的改變。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ries*, op.cit., pp. 26 – 33.

¹¹ 乃是指學者研究國際組織只是因為某一國際組織存在的事實，而非基於該組織獨特的重要性。

經提出類似的概念，特別是兩人老師 Aron 所提出來的跨國社會 (transnational society) 概念，更是對於 Keohane 與 Nye 帶來直接的啓發¹²。不過，Keohane 與 Nye 也承認，跨國社會的概念忽略了國家對於跨國關係操縱的可能性。因此，他們的主軸放在國家與跨國社會的互動以及次國家單元之間所形成的跨國聯盟¹³。作為受邀作者之一，Gilpin 的文章恰是要反駁 Keohane 及 Nye 的觀點。他要提醒跨國政治的主張者，國家間關係才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跨國關係是因為國家的允許才存在，也會因為國家的政策改變而消失。

有趣的是，在 1998 年由卡讚斯坦(Peter Katzenstein)、Keohane、和克萊斯納(Stephen Krasner)三人共同撰寫的一篇國際政治經濟學回顧性文章之中，三位重量級的學者表示，跨國關係研究乃是 60 年代末期以來自由主義挑戰現實主義最重要的論述之一。自由主義從四個方面挑戰現實主義，分別是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觀、國家同質觀、理性行爲者假設、以及無政府狀態。尤其是前兩者，更是受到新功能主義、官僚政治、和跨國關係論述的巨大衝擊。而新功能主義、官僚政治、和跨國關係論述，皆立基於多元主義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理論。但是，無論是官僚政治觀點還是跨國關係論述，雖然提供豐富的描述性素材，卻很難加以操作化來

¹² 可參照：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Karl Kaiser, "Transnationale Politik: Zu einer Theorie der multinationalen Politik,"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Sonderheft, Nr. 1(1969), S. 80-109; Horst Menderhausen, "Transnational Society vs State Sovereignty," *Kyklos*, Vol. 22, No. 2(May 1969), pp. 251 – 275; James Rosenau,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Keohane 和 Nye 並未於文中索引 Phillip Jessup 的文章，僅提及國際法律師和經濟學家較不受到國家中心典範的拘束，此可證諸 Richard Cooper, Raymond Vernon, Phillip Jessup 的著作。經查考，Phillip Jessup 於 1965 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跨國法律」(*Transnational Law*)一書，應為這兩位作者所稱的相關著作。

¹³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vii-viii.

說明其間的因果關係¹⁴。由此觀之，Gilpin 的論述不但是要反駁 Keohane 與 Nye 對於跨國關係過度樂觀的危險，而且是要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回應自由主義的挑戰。更進一步說，以現實主義的立場回應自由主義的挑戰，也可看作是將國際關係的基本假設帶到世界經濟的研究。因為，70 年初期，現實主義的假設和論述仍然是國際關係的基本論述，而跨國關係專刊又聚集不少經濟學者和管理學者的研究。因此，對於現實主義的捍衛，形同捍衛國際關係學者在世界經濟研究的發言地位¹⁵。從後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看，Gilpin 的影響是將權力與國家帶回國際經濟研究，而後來無論是 Keohane 與 Nye 的「權力與互賴」還是 Keohane 的「霸權之後」，不但修正早先的立場，不再否定權力的重要地位¹⁶，還進一步以國家間的合作，作為國際制度建立和國際經濟運作的基礎，間接證實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Gilpin 作為理論發展的基本假設。只是，當雙方都接受國家和權力的重要性後，經濟民族主義反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程上退去。為何如此，得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流變找尋線索。

參、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流變

自 1990 年以後，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開始反省學科知識的分類，進一

¹⁴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 (Autumn 1998), pp. 658-660.

¹⁵ 在「跨國關係和世界政治」的二十位作者之中，僅有不到一半為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者(八位)，其他分別是一位經濟學者、兩位歷史學者和兩位國際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三位管理學者、和四位社會學者。

¹⁶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Autumn 1987), p. 725.

步提出「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和「正統國際政治經濟學」(Orthodox IPE)二派分立的觀點¹⁷。自此之後，陸續有學者對於大西洋兩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派分立進行探討¹⁸。在墨菲(Craig Murphy)與尼爾森(Douglas Nelson)的文章中，他們將存在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學派分別定名為以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刊為中心的「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或稱「國際組織期刊學派(IO School)」以及以「國際事務」期刊(International Affairs)與晚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期刊為中心的「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或稱為「批判學派(Critical IPE)」¹⁹。簡而言之，美國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兩個問題：全球經濟的權力分配以及國家合作的可能性²⁰，其研究焦點則為財富與權力的關係、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利益與制度的關係以及國際政治經濟與國內政治的關係²¹。至於英國學派的核心關懷，則是對二次大戰後美國一手建立的世界經濟秩序，在 1970 年代初期逐漸展現的疲弱和崩壞徵兆，感到憂慮而嘗試尋求解決途徑。同時，英國學派嘗試打破正統國際政治經濟學將政治和經濟分離以及將國際和國內分離

¹⁷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p. 5-6.

¹⁸ Geoffrey R. D. Underhill,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October 2000), pp. 805-824. Craig Murphy and Douglas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October 2001), pp. 393-412; Amanda Dickin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3(May 2006), pp. 479-492;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Benjamin Cohe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 (May 2007), pp. 197-219.

¹⁹ Craig Murphy and Douglas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op.cit.*, p. 394.

²⁰ 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

²¹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684.

的二個基本假設，正視社會科學不可避免的主觀性以及嘗試多元的歷史和社會解釋途徑，並將廣大的社會與道德議題拉進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之中，這英國學派最特別之處²²。

儘管，90年代以後，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兩派之爭，已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知識的基本架構。但是，這絕非表示三大典範已失去其提供學科基本理論的地位。根據本文追蹤1970年代以來11本橫跨美國學派和英國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²³，發現國際政治經濟學於80年代受國際關係理論影響甚深，三大意識型態的辯論主導了學科內的典範界定與發展。90年代之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普遍於傳統Gilpin的三大典範之外，加上名稱不一的新典範。例如瑞夫希爾(John Ravenhill)的當代途徑，包含許多新興而無法明確歸類的議題與方法²⁴、瓊斯(Barry Jones)的歷史制度途徑與制度主義、以及史都本(Richard Stubbs)和昂德希爾(Geoffrey Underhill)提出的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但是三大典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教科書中國際政治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典範。以下，將此11本教科書典範分類整理如下：

²²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op.cit.*, pp. 2-6.

²³ 本文根據三項標準判斷，分別作者接受研究訓練的學校所在地，是美國還是英國或第三地；作者與美國國際組織期刊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或英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小組 (IPEG) 的淵源；以及作者自己的宣稱或歸類。同時，本文以英國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或新國際政治經濟學正式命名的1991年為界，觀察九零年代前後學者對典範界定的變化。

²⁴ 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15.

| 美國學派、英國學派、和典範分類 ²⁵ | | | | | | |
|-------------------------------|----------------|-----------------------|-----------------|--------------------|--|-----------------------|
| | 美國學派 | | | 英國學派 | | |
| | 作者 | 典範分類 | | 作者 | 典範分類 | |
| | | 傳統典範 | 新增典範 | | 傳統典範 | 新增典範 |
| 1977-1990 | Spero | 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帝國主義 | | Strange (Tooze) | 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結構主義 世界體系論 | |
| | Gilpin |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 | Gill & Law | 現實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 |
| 1991-2008 | Frieden & Lake |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 國際/國內 國家/社會 | Jones | 經濟現實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 結構主義 制度主義 |
| | Ravenhill |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 當代途徑 (建構主義等) | O'Brien & Williams | 經濟國族主義 自由主義 | 批判觀點 |
| | Miller | 自由市場主義 馬克思主義 | 多中心組織 | Stubb & Underhill |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 後現代主義 環境主義 女性主義 |
| | Cohn |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結構主義 | 社會建構主義 女性主義 | | | |

來源：左正東、楊道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嘉義：中正大學，2008年5月1日）

雖然，承認三大典範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是美國學派和英國學派的共識。但是，兩派各自有其偏重。英國學派雖仍強調典範對於理論的引導作用，但在典範之中不侷限於過去的三大典範，而致力於樹立新興典範，並特別重視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論範式，和典範之間的對立和辯論。這點反映英國學派承襲馬克思主義傳統，特別是自考克斯(Robert Cox)以降所引為圭臬的新葛蘭西學派(Neo-Gramscism)。至於美國學派的學者則

²⁵ 本表主要貢獻者為楊道昀先生，在此一併申謝。

是降低典範的重要性，例如法蘭德(Jeffrey Frieden)與雷克(David Lake)²⁶批評三分法的界限模糊不清。比如馬克思主義範疇下的理論，時而贊同現實主義的國家衝突，時而偏好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經濟利益。因此二人提出國際層次/國內層次以及國家/社會的雙層分類，認為是比三大典範更與時俱進的分析架構²⁷。同樣的，Ravenhill 認為三分法將完全不同的觀點錯置於同一個分類下，無法反映出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發展，也無法用以探討現實的政策議題²⁸。論其實際，美國學派並非同等地拒絕三大典範。相反的，美國學派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以分析層次取代理論典範，構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架構。所謂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乃是指其接受 70 年代以來跨國關係研究所強調的官僚政治和多元社會為基本假設。而所謂以分析層次取代理論典範，則是將國際政治經濟學分為國際層次的國際建制研究和國內層次的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看不同場域的制度結構如何影響利益表達和政策產出。這是 Frieden 和 Lake 所談的雙層分類，也是晚近兩派辯論美國學派所談的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將利益、制度、和國際談判視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工具²⁹。

可以說，90 年代美國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典範上已經歸於一尊，形成新自由制度主義獨霸的局面。因此，不但對於其他典範的研究急遽減少，典範間的辯論更不復見³⁰。對於美國學派定於一尊的現象，有兩個因素可以解釋。第一是 90 年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逐漸從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辯論，轉向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辯論，而建構主義所重視的理念因素在國際經濟問題的適用性又遠不如在國際政治問題來的廣泛³¹。其次，由於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再度成為獨霸，而資訊科技革命

²⁶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3rd edit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13.

²⁷ *Ibid.*, p.13.

²⁸ 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p. 17-19.

²⁹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62-768.

³⁰ 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Bridge Too Far or a Bridge to Nowhere?" presented for the IPES Meet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November 9, 2007), p. 12.

³¹ *Ibid.*, pp. 19-20.

帶給美國資通訊產業的極大優勢，更讓美國經濟享受 70 年代以來難得的經濟榮景。因此，自由開放立場成爲美國思想主流和符合實質利益的政策選項，典範間辯論的政策意義大幅度降低。但是，如此的定於一尊，令人不盡滿意。對照在 70 年代中期 Gilpin 所提出的三大典範，如今自由主義成爲主流，馬克思主義及其支流有英國學派延續香火，反而是民族主義者或現實主義者乏人問津。雖然仍名列於一般教科書，但是連其名稱都充滿爭議，更說明此一典範在概念和理論發展的遲滯³²。緣此之故，本文嘗試探索經濟民族主義如何可能成爲國際政治經濟學真正具有提出問題和建構理論的研究典範，以彌補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重大不足。要進行此一嘗試之前，下一節先釐清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

肆、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

以國家政策規範國際商業關係自古即有，15、16 世紀多以重商主義描述國家對國際商業的管制，19 世紀則多以保護主義稱之。但是，直到 1928 年經濟學家帕斯佛斯基(Leo Pasvolsky)撰寫的「多瑙河流域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 of the Danubian States)一書問世後³³，「經濟民族主義」一詞才算正式問世³⁴。雖然，30 年代經濟民族主義被用於描述東歐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各國在大蕭條之後所採取的經濟對策，稱得上當時廣泛使用的語彙。不過，戰後學界的關注卻相當有限，學者歸之於經濟民族主義缺乏明確的定義，特別是「民族主義」本

³² 三大典範中，只有自由主義的名稱以一貫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則被其他作者以國家主義(statism)、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現實主義(realism)或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代替之；馬克思主義則有時加上結構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或帝國主義。

³³ Leo Pasvolsky, *Economic Nationalism of the Danubian States* (New York: Allen & Unwin, 1928).

³⁴ 此一說法出自 Michael Heilperin，請見 Michael Heilperin, *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 (Genève: Librairie E. Droz, 1962), p. 16.

身該如何定義都很難達成共識，要再結合特定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更加困難³⁵。

簡單來說，民族是一種對群體的界定方式，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政治原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社群，意味著民族成員絕大多數不認識彼此，但在其心中卻存在著共享的形象³⁶。葛尼爾(Ernest Gellner)和霍布斯保(Eric Hobsbawm)進一步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主張政治和民族單元合一的政治原則。在此原則之下，民族成員對於代表民族之政體所應承擔的義務，高過於對其他一切公共組織所應盡之責任³⁷。由於民族之建構仰賴於想像，因此，印刷科技和資本主義的結合，提供統一的溝通平台，給既有的語言新的穩定性，加上教育普及和識字率提升，讓官方語言得以生根，更是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步發展極為重要的原因³⁸。至於經濟民族主義，如果用其所選擇的經濟政策加以界定，倒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具體。長久以來，經濟民族主義與其所捍衛的保護主義政策和鼓勵民族工業發展密不可分。事實上，1929年經濟大恐慌後有關經濟民族主義的文獻大多將經濟民族主義視為與自由開放貿易政策相反的經濟政策³⁹。因此，經濟民族主義不是要在理論上與新古典經濟學派相對立，而是強調透過一套對外經濟政策，讓國家可

³⁵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William Rappard eds.,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77;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pp.16-18.

³⁶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p. 6.

³⁷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

³⁸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op. cit.*, p. 46;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 *op. cit.*, p. 10.

³⁹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2 (January 1935), pp. 82-90.

以免於外國的經濟干預⁴⁰。既然要追求經濟獨立，經濟民族主義很容易和計劃經濟(*planning economy*)相互結合⁴¹。正如 20 世紀 60 年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詹森(*Harry Johnson*)所說，經濟民族主義就是一種增加國家與國民財富的經濟計劃⁴²。

正因為要追求經濟獨立，因此，經濟民族主義不是要讓國家更富有，而是更自由；其目的並非提昇國民物質福利，而是提升國家的獨立和自主，也就是要達成國家的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⁴³。這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因為一次戰後經濟大恐慌帶來的幣值不穩定以及原物料與商品價格波動的不確定性，爲了不讓國家經濟發展脫離上述不確定，國家經濟自給自足的想法應運而生⁴⁴。落實在具體的政策上，則包括禁止外國人擁有本國天然資源、禁止外國人持有本國產業、對於已爲外國人持有之天然資源或財產進行登記(*nostrification*)和國有化、採取關稅保護、補貼、和特殊價格政策、規定國民使用本國產品、透過金融管制維持金融收支平衡和提高現金流量、對特定管理階層的雇用要求具備本族群身分、限制或移民或少數族群⁴⁵。考夫曼(*Jan Kofman*)將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簡化爲四項重要支柱，分別是國家主義 (*Statism*)、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⁴⁰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77

⁴¹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80(July 1935), pp. 203-206.

⁴² Harry Johns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0, No. 2 (June 1965), pp. 169-185.

⁴³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83-84.

⁴⁴ J. Gregory Sm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45, No. 180(December 1935), pp. 619-648.

⁴⁵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1939)*, Vol. 10, No. 3(May 1931), pp. 295-297;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85-87; Michael Heilperin, *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27; Jan Kofm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p. 67-68; Harry Johns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op. cit.* pp. 170 – 171; Albert Breton, "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2, No.4 (August 1964), pp.376-386.

自給自足政策 (Autarky)與工業化 (Industrialism)，而這四項內涵再透過「國家精神 (the spirit of state)」融合成具體的政策⁴⁶。雖然，究竟哪種政策最有助於實現國家經濟獨立，其對國家經濟整體影響如何，學者看法各自不一。但從既有的研究文獻看來，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與過去重商主義或保護主義顯著不同之處，在於其強烈的內向性格，也就是針對國家境內具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群，採取歧視性政策以改變國內經濟結構，促進本國多數族群經濟實力的成長⁴⁷。也可以說因為兩次大戰期間的經濟民族主義實踐，造成大蕭條的延續和對境內少數民族的迫害，使得經濟民族主義聲名狼藉，論者多從負面角度看待。

也是因為如此，一般人會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就是站在自由貿易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對立面，這也是經濟民族主義廣受批評的主要原因。主張自由經濟的學者特別如此，他們認為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以及因應戰爭而強調國家生產的作法，與帝國主義的邏輯無異，皆抵觸經濟國際主義的理想⁴⁸。關稅保護扭曲國際價格機制，也破壞全球勞工的比較利益法則，更會帶來相互仿效的貿易壁壘⁴⁹。然而，晚近十年愈來愈多學者撰文力陳經濟民族主義與自由貿易絕非對立。一方面，早期經濟民族主義論者如李斯特(Friedrich List)與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並未排斥自由貿易，甚至多處援引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只是自由貿易在政治經濟都尚待發展的國家無法發揮原有效益，因此他們支持有限度的保護主義

⁴⁶ Jan Kofm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op. cit.*, p. 33.

⁴⁷ *Ibid.*, pp. 75-77.

⁴⁸ Cyril F. James,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Wa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75 (September 1934), p. 66.

⁴⁹ *Ibid.*, p. 84;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206;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9.

來協助國內產業工業化⁵⁰。另一方面，採行自由貿易與金本位制度可視為壯大國家經濟發展與增加國家權力的工具。所以，經濟民族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並非完全對立，兩者的差別在於經濟民族主義者是站在自由主義者所認為之「錯誤」的立場採行這些政策⁵¹。其實，打破經濟民族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二元對立的看法，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即已有之。學者莫菲特(J. E. Moffat)早在 1928 年即指出，亞當斯密對民族市場與民族權力的詮釋沒有背離國族主義的思維，在國富論中，民族主義的概念比世界主義顯眼得多。正如國富論所稱，「各國政治經濟的最大目標，皆在於增加國家的財富與權力」⁵²。相對於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距離更遠。因為馬克思主義著重計畫經濟和追求自給自足，雖和部分經濟民族主義者所選擇的方法相近。但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階級取代國家與經濟民族主義者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基本立場截然對立，而且，部分經濟民族主義者亦與經濟自由主義者相互呼應，反對計畫經濟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不過，除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思想，90 年代末期以來的學者，更為強調重新探索經濟民族主義所以歷久不衰的內在動力。正如下一節說明，其關鍵在於推動經濟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民族主義。

⁵⁰ Margerum Harlen, "A reappraisal of classica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4 (December 1999), p. 739, 742.

⁵¹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1(January 2003), pp. 105-127; Eric Hellein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3 (September 2002), pp. 307-329.

⁵² James Moffat,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No.4, (August 1928) pp. 428-431.

伍、民族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的重新連結

做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典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各自有其特定的價值判斷和由此而來的政策偏好，經濟民族主義也不例外。正如其名，經濟民族主義的這套思想體系就是民族主義。而且，與另外二者不同的，乃是此一價值系統對於經濟政策的塑造和指導，在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發揮具有關鍵的地位。在下一節探討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之前，本節回顧晚近從民族主義重新思考經濟民族主義的相關研究。

長久以來，經濟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被視為兩個同義詞，但其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則往往被人忽略。原因之一，在於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獨立並迅速發展後，強調國家干預與國家利益者被歸類為經濟民族主義者。於是國家取代民族，民族主義在經濟政策上不再具有重要性⁵³。雖然，一次大戰之後學界已有人開始反省，並嘗試連結民族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但為數仍相當有限。⁵⁴ 二次大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脫離前殖民宗主國獨立後，並相繼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但是，當時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如 Johnson 和布雷頓(Albert Breton)認為這些政策不符合經濟理性。因為，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如資產國有化等，只是追求滿足民族主義情感的精神收入(psychic income)，不但無法極大化國家財富，反而會犧牲國家的實質收入⁵⁵。更有甚者，因為民族主義所帶來的財富重分配，只嘉惠社會的部分成員，而非所有成員。正因其可能受惠，潛在受惠者

⁵³ *Ibid.*, p. 418.

⁵⁴ 著名的如 E. H. Carr 和 Charles Schrecker，請參閱 E.H. Carr,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和 Charles Schrecker, "The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p. cit.*, pp. 208-225.

⁵⁵ Harry Johns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op. cit.*, pp. 183-184.

會投入可觀的資源，極大化民族和族群身分的價值⁵⁶。

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相當有限。⁵⁷直到 90 年代晚期，學界再度興起熱烈討論。晚近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檢討，提出兩個與過去不同的新觀點。第一是強調「將民族帶回」(bring the nation back in)，改變過去以國家(state)為核心的研究視野，轉而以民族(nation)為中心，強調民族主義在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關鍵地位。第二點則是認為以實現民族主義為目的之經濟民族主義，不應限定於特定的經濟政策，而可包含過去被認為與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對立的自由貿易政策及其他經濟政策選項⁵⁸。相對於 60 年代，晚近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檢討，打破過去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刻板印象，更傾向於承認經濟民族主義的正面貢獻。與此同時，因為內涵更加豐富多元，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發展也呈現多線併行的趨勢。

簡而言之，晚近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檢討分為二個方向，第一是經濟政策的目的為何，第二是經濟政策的效果如何。首先，經濟民族主義將民族主義的實現，視為經濟政策的目的。雖然民族主義本身有多種定義，但皆強調追求國家與民族的合一⁵⁹。因此，以實現民族主義為目的之經濟政策，其關鍵在於創造民族認同，強化民族團結，讓民族獲得「繁榮、文明、和權力」⁶⁰。反過來說，經濟民族主義者也會積極動員民族資源

⁵⁶ Albert Breton, "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 *op. cit.*, p.376.

⁵⁷ 80 年代的兩本書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op. cit.* 以及 Otto Hieronymi,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0)，算是當時少數針對經濟民族主義的專著。

⁵⁸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1(March 1998), pp. 55-56; Eric Hellein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op. cit.*, pp. 307-308;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0, No. 3(July 2004), pp. 211-212.

⁵⁹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p. cit.*, pp. 24.

⁶⁰ Eric Hellein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實現經濟發展，以將經濟發展的果實分享社會各階層，避免經濟政策破壞民族團結⁶¹。畢竟，經濟目標的追求只是手段，國族情感才是最終的目的。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創造民族認同，是因為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擴大溝通與動員，邁向工業社會過程所累積的歷史記憶，乃至於快速工業化帶來的民族榮耀，都有助於創造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像共同體⁶²。20世紀30年代東歐所採取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說是以經濟政策創造民族認同的早期案例⁶³。韓國在二次戰後以其經濟成就塑造民族意識，從而渡過亞洲金融風暴後的劇烈調整時期，則是晚近的經典代表⁶⁴。

其次，基於民族主義所採取的政策，其效果主要是實現經濟的自主(autonomy)。但是，何謂經濟的自主呢？究竟指國家的獨立自主或是民族的獨立自主則不無疑問。若是指國家在經濟上之獨立自主，則經濟民族主義很難不和追求經濟自給自足(autarky)，以避免外力決定國家命運相連結。要將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自給自足相區隔，則重點應在於民族的獨立自主，其關鍵乃在於由生產權力和民族權力構成的國家權力。其實，30年代學者葛瑞格(Theodore E. Gregory)就以提升國家權力為核心之意識型態來定義經濟民族主義。他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於提升國家政治權力，而非社會經濟福祉；關切的是如何鞏固國家整體政治實力，而非組成國家的個體經濟福利。因為對於經濟民族主義者來說，超

From The 19th Century,” *op. cit.*, p. 322.

⁶¹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222.

⁶²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66-69; *ibid.*, pp. 219-220.

⁶³ Jan Kofm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op. cit.*, pp. 7-10.

⁶⁴ Cox 認為凱因斯福利國家和拉丁美洲的新重商主義，皆為20世紀的經濟民族主義。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51 - 189;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61 - 62)

越個體之上的國家，其權力與名聲的追求遠比其他行為者的福祉更為重要。⁶⁵但是，何謂國家權力呢？對此，List 所提出的生產權力(*productive power*)和中野剛志(Takeshi Nakano)提出的民族權力(*national power*)，極具參考價值。List 認為，國家權力的來源為質量兼備的生產權力，指的是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有效的相互作用，這是財富的來源，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關鍵，更是國家權力的來源⁶⁶。中野剛志則進一步將從民族而來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兩者結合稱之為民族權力，此一權力之運用讓國家可以包容公民社會，進而強化其政治權力。而國家的政治權力獲得強化後，又可藉此創造全國市場和推動快速工業化，從而以經濟成就塑造和強化民族價值和民族情感⁶⁷。而且，民族主義被認為可用以實現經濟發展，其可能的途徑包括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經濟體制、進行社會動員以達成快速的工業化、以及鞏固國家在經濟開放過程的合法性。⁶⁸ 民族主義所以能促進工業化，是因為其所強調的平等觀念，有利於工業社會所需要社會流動。同時，經濟實踐和工業化成就又有助於超越既有的宗派和族群藩籬，從而培育民族主義，再創造民族認同⁶⁹。同時，借助民族主義的引導，國家機器也可通過採行促進與區域和全球整合的經濟政策，創造和強化其自身所需要的合法性⁷⁰。

⁶⁵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1939)*, Vol. 10, No. 3(1931), p. 289.

⁶⁶ Fried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Sampson S. Lloyd (London: Longmans, 1992), p.131; David Levi-Faur, "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3 (July 1997), pp. 361-363.

⁶⁷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21-222.

⁶⁸ Andreas Pickel 稱此為「民族化機制」(*nationalizing mechanism*)，與 Michael Billing 所稱的「平實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有異曲同工之妙。(Pickel, 2003: 118 ; Billing, 1995)

⁶⁹ Takeshi Nakano,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19-220.

⁷⁰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118-112.

雖然，凸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之中的民族主義因素，可以將經濟民族主義和傳統上與之混淆的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相區隔。鑒於民族主義本身難以度量的先天限制，若以此發展研究途徑，很難避免陷入目的與效果之間的套套邏輯。換句話說，要發展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要選擇合適的研究問題，既立足於民族主義，又能跳脫目的與效果的瓶頸。本文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應當聚焦於民族主義如何影響對外經濟政策的選擇，並於下一節詳細說明。

陸、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研究途徑

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義究竟會走向保護主義還是追求自由開放，端視特定之歷史情境而決定。因此，探討經濟民族主義的關鍵是條件問題，也就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民族主義會成為影響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導致對外保護主義和對內的經濟歧視政策？而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促進對外的自由貿易和對內的經濟平等政策？對此問題，學者的研究呈現兩種不同的回答方式。第一是實證主義的因果關係研究途徑，也就是從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個人層次的因素，來看為何民族主義會引導經濟政策，以及為何民族主義的優勢地位會導向自由開放或貿易保護。第二則是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途徑，也就是從歷史與文化的反省，來看經濟政策和民族認同相互建構的過程。

首先，實證主義因果關係的研究在兩次大戰期間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大蕭條之後的學者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指出了兩種經濟民族主

義出現的原因⁷¹。一種是帶有抱歉性質(apologetic)的理由，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是爲了戰時的需要和因應經濟大蕭條，而「不得不」這麼做。第二種是基於反抗的(defiant)的動機，強調增加國家能力與先進國家抗衡，是「主動」如此。之所以「不得不」，是因爲戰爭打亂國際貿易秩序，戰後經濟衰退，各國執政者因爲戰爭陰影未散，懼怕在經濟上依賴他國，而「不得不」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⁷²。而且，一次大戰造成各國幣值的貶值幅度不一，導致國際貿易缺乏必要的交易基礎，加上 1929 年的經濟大恐慌，自給自足成爲唯一的因應對策⁷³。至於「主動」的原因，則是來自對於外國控制和外來競爭的懼怕，包括懼怕本國產品過於依賴外國市場、懼怕外國資本對本國市場的干預、渴望保存國內產業、不希望國內原物料遭受外國廠商把持、希望發展本國自身的產品、和保存國內農業以應付未來的戰爭，因而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⁷⁴。

二次戰後，經濟民族主義再度出現於新興獨立國家。布尼爾(Peter Burnell)認爲要解釋 60 年代以降新興獨立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非殖民化運動的刺激、國際經濟結構限制、有利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需要考慮，都是重要因素。首先，非殖民化要求建立實現政治獨立，殖民時代的經濟剝削被認爲是非殖民運動一定要剷除的對象。一旦政治獨立實現，伴隨政治獨立而來的政治機會使用殆盡，新興獨立國家的政治菁英就會推動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其次，由於既存的國際經濟條件對於新興獨立國家極爲不利，因此，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成爲新興獨立國家的武器。

⁷¹ William Rapp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9.

⁷² Francis Sayre,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 82; Charles Schrecker, "The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3, No. 2 (March-April 1934), pp. 208-225.

⁷³ Arthur Feiler,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04 – 205; J. Gregory Sm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p. cit.*, pp. 619-648.

⁷⁴ Theodor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292-294.

第三，國際政治環境提供的條件，有利於經濟民族主義。自 60 年代中期，美蘇逐漸從冷戰轉向低盪，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政策的干預逐漸放鬆。同時，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甦，也給予各國更大的自主空間。此外，部分已開發國家所採取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跨國公司運用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保護其既得利益、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都是促進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原因。第四，國內經濟因素如豐富的自然資源、逐漸成熟的國內經濟力量給予國家自信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國外威脅感的增加和國內政治不穩定和合法性的危機，也都會驅使國家採取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⁷⁵。

對於 90 年代興起的區域經濟整合浪潮，舒爾曼(Stephen Shulman)則以民族主義的三大目標—自主、團結、和認同，以及特定政策對於多數或少數族群就此三大目標之滿足程度，解釋國家及其境內民族的政策選擇。Shulman 的研究發現，儘管基於維護自主，民族國家會傾向降低對外貿易依賴，但是，如果貿易可以增加財富，或是可以分散對特定貿易對手國的依賴，民族國家還是會趨向於增進貿易。基於促進民族團結，國家可能趨向與其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整合，也可能減少對外貿易，以增進其國內的經濟整合程度。基於鞏固民族認同，民族國家可能減少對外貿易，以避免外來文化衝擊。民族國家也可能增加與其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間的經濟聯繫，或減少與其不同民族之其他國家間的經濟聯繫，以強化其我族認同。同樣的，民族國家也可能積極追求經濟整合，以成功的經濟表現創造民族榮耀和自信。當然，上述的分析，會因為該民族為國境內多數民族或少數民族而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多數民族的威脅是來自於國境之外的強權，少數民族的威脅是來自於境內的多數民族

⁷⁵ Peter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op. cit.*, pp.53-84.

⁷⁶。另外，丹特(Christopher Dent)在比較新加坡、南韓、和台灣對外經濟政策的研究中，將意識形態和經濟民族主義加以區隔，認為意識形態是決策者所信奉的基本理念，如傳統的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分法，以及該國獨特的價值系統、特殊的經濟文化(economic culture)、甚至決策者各人的務實傾向，都應該包括在內⁷⁷。至於做為一種思潮的經濟民族主義，則是基於國內社會的要求，進而左右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決策⁷⁸。決策者所信奉的理念和國內社會的民族主義浪潮，會同時影響政府對於對外經濟政策的目標制定⁷⁹。

其次，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強調的是經濟政策選擇和民族認同兩者的相互構成，正如學者對於「經濟民族」(economic nation)的探討，其既強調對於經濟經驗的共同記憶，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無論此一記憶是成功發展還是飽受剝削，而民族認同的建立過程，又會進一步塑造和決定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國家利益⁸⁰。經濟民族所傳達的政策選擇和民族認同兩者之間的相互構成關係，已經隱含了建構主義做為經濟民族主義研究的極大潛能。21 世紀初期哈佛大學的阿布德勞(Rawi Abdelal)教授和波士頓大學的葛林菲德(Liah Greenfield)教授分別撰寫的專書，提供極有價值的示範。

Abdelal 在其對前蘇聯國家是否選擇和俄羅斯進行經濟整合的研究之中，總結民族主義對於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四個重要意義，分別是民

⁷⁶ Stephen Shulman, "Nation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3(September 2000), pp. 369-373.

⁷⁷ Christopher Dent,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pp. 11-13.

⁷⁸ *Ibid.*, p. 25.

⁷⁹ *Ibid.*, p. 8.

⁸⁰ George Cran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op. cit.*, pp. 55-56, 68. Andreas Pickel,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op. cit.*, pp. 105-127.和 Levi-Faur, "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 *op. cit.*, pp. 359-370.同樣提到經濟民族和以經濟發展建構民族和創造民族榮耀。

族主義給予政策根本的社會目的、民族主義合理化基於此社會目的所帶來的犧牲、民族主義拉長政府和社會對於政策效果的時間軸、以及民族主義給予國家對外經濟政策一定的方向感⁸¹。然而，任何民族主義的主張都是一種定義，也嘗試對其他定義給予回應。因此，研究民族主義對於經濟政策的影響，必須先從菁英對於民族主義的主張(content)⁸²和其間的爭辯(contestation)開始。以民族主義爭辯所凸顯的民族認同為情境因素，再來檢視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偏好及具體策略，來看兩者之間如何相互連動與相互構成⁸³。與 Abdelal 強調策略選擇有所不同，Greenfield 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就是以民族主義來解釋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成果。她認為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極大的關係。因為其本質上的平等精神(egalitarianism)，民族主義具有開放社會階層流動和釋放勞動力量的效果，從而創造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社會結構。而且，由於強調民族的尊嚴與威望，民族主義會刺激民族成員投入國際競爭和致力於經濟成長，從而改變長期以來將商人階級置於社會底層對於經濟發展的限制，從而帶來社會力的釋放和長期的經濟成長⁸⁴。

儘管，近十年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較之於過去更加嚴謹和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盲點。首先，採取實證因果關係途徑的研究，大多數仍將經濟民族主義簡化為採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而沒有區分民族主義者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的不同態樣，更遑論

⁸¹ 這裡所稱的方向感，是指哪個民族的經濟依賴是危險的，以及與那個國家的經濟依賴是互利的。Rawi Abdelal,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⁸² 民族主義的主張包括誰是民族的成員、政治權威的目的、以及誰構成對此一目的的威脅。Ibid., p. 26.

⁸³ Ibid., pp. 42-44.

⁸⁴ Liah Greenfi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26.

認識到民族主義者將對外開放和推動區域整合納入政治議程的可能性。這點，晚近 Shulman 的研究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和民族主義者政治議程相互結合，可算是理論研究的一大突破。但是，民族主義者如何在不同的保護政策進行選擇，過去的研究還鮮少觸及。誠如前述，經濟民族主義除了貿易保護政策之外，也可以展現為特定的匯率政策或技術移轉策略，前者指採取將本國經濟與外國影響隔離的貨幣政策，以確保本國的政策自主性，也可稱之為「貨幣民族主義」(monetary nationalism)⁸⁵。後者則是指科技領先國家為維持本國科技優勢，對於技術援助和技術輸出加以管制，也可以指後進國家通過科技政策實現工業化和技術追趕⁸⁶。此外，在產業科技已向全球快速擴散的今日，國家基於對科技的崇拜(fetishisation)，仍然會致力於發展本土的高科技產業，即令開發本土技術耗費甚鉅，成功機率也極不確定，學者稱之為「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⁸⁷。對於國家在這些不同類型政策間的選擇，是經濟民族主義應該要解釋和理解的範圍。

其次，兩次大戰期間的研究將經濟民族主義看作對於外在環境的回應。到 60 年代的研究雖已逐漸重視內部的政治不穩定或是政治領袖對於族群利益的計算，可能導致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但外在的結構限制和環境仍是重要因素。然而，晚近的研究如 Shulman 和 Pickel 卻完全轉向國內因素的考量，忽略外在結構對於國內經濟政策的形塑和限制，反而模糊多數民族主義政策所具有的針對特定對象和回應外在壓力的特

⁸⁵ Otto Hieronymi,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Otto Hieronymi eds.,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 18; Friedrich Hayak, *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London: Longmans, 1937), p. 4.

⁸⁶ Keichi Oshima,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Otto Hieronymi ed.,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 202.

⁸⁷ Sylvia Ostry and Richard R. Nelson, *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質。特別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往往是小國或後進國家的政策武器，其是否採取及如何運用，自不能脫離小國或後進國家受面臨大國或先進國家的結構限制。以此來看，採取後實證建構關係途徑的研究，較能結合國際結構限制和國內政治動態，並且從兩者之相互構成闡述民族主義框架如何形塑對外經濟政策的選擇。當然，如此的分析國內因素還是主要的闡述來源。因為，民族主義的政治議程，最後還是必須通過國內政治的動態角力來決定其政策界定能力。只不過，此一議程界定既以創造民族主義者所期待的民族榮耀為目標，也受到民族主義者對於外在經濟與軍事威脅之解讀，其動態角力更無法完全避免大國或先進國家對小國或後進國家的介入。而且，強調民族主義與經濟政策之間的相互建構，也可以擴大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範圍，而不限於貿易保護主義，讓民族主義成為跨越國際政治經濟學各別議題領域的理論典範。

不過，研究意識形態和國際經濟關係者，並非僅限於經濟民族主義。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之中無論現實主義者如 Krasner、自由主義者如魯吉(John Ruggie)、或是批判學派如 Cox，皆有所觸及。但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談的意識型態與其他學派有所不同。Krasner 所談的意識型態是國家的政治願景(political vision)，也是國家對其外交政策的說服性解釋(persuasive explanation)。他認為唯有當國家享有絕對的霸權地位時，才會以其政治願景投射於對外政策，當然也包括對外經濟政策。也因為如此，在美國這樣的多元社會，卻能夠採取超越其社會需要且長期一致的對外經濟政策⁸⁸。其次，Ruggie 所談的理念因素是合法的社會目的(legitimate social purpose)，也是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y)必須包含的元素。他認為權力分配只能決定世界秩序的形式(form)，真正決定世界秩

⁸⁸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37-342.

序內容(content)的是政治權威的社會目的。即便權力分配改變，只要社會目的仍被廣泛接受，國際建制的規範性框架仍可繼續維持⁸⁹。而 Cox 則認為國際關係中的理念因素，包含了間主觀的意義(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和對於社會秩序的集體形象(collective images of social order)，前者指的是對於社會關係本質的共同認識，如民族國家和主權制度，而後者則是對於權力關係的本質、合法性、以及正義和公共財的看法。在特定歷史結構下，絕大多數人共享一套間主觀意義，卻存在多種不同的集體形象。集體形象的相互競爭最終帶來間主觀意義的改變和歷史結構的變遷⁹⁰。

很顯然的，Ruggie 和 Cox 所談的理念因素固然皆有其正義觀，也對於國際經濟關係具有長期持續的影響。但是，兩者皆從體系範圍來界定理念和理念因素的影響，和經濟民族主義以國族為範圍的正義觀有一定的落差。Krasner 所談的國家利益，在範圍上和經濟民族主義一樣以民族國家為限。而且，他將意識形態界定為國家的政治願景和超越於社會需要的政策目標，與民族主義所談的想像共同體和超越個體的總體利益，也若合符節。但是，Krasner 所談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元素，是美國立國精神的對外投射，是在美國國力達到頂峰之後的外交行為模式。這點，和經濟民族主義者是弱國在面臨生存危機之際，以保護政策和快速工業化來建構民族和回應龐大的內外政經壓力。特別不同之處，在於 Krasner 認為抽象的立國精神是指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而經濟民族主義者所看到的意識形態，則是為自身民族絕續存亡所提出的謀生計和求發

⁸⁹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Spring 1982), pp. 382-385.

⁹⁰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June 1981) p.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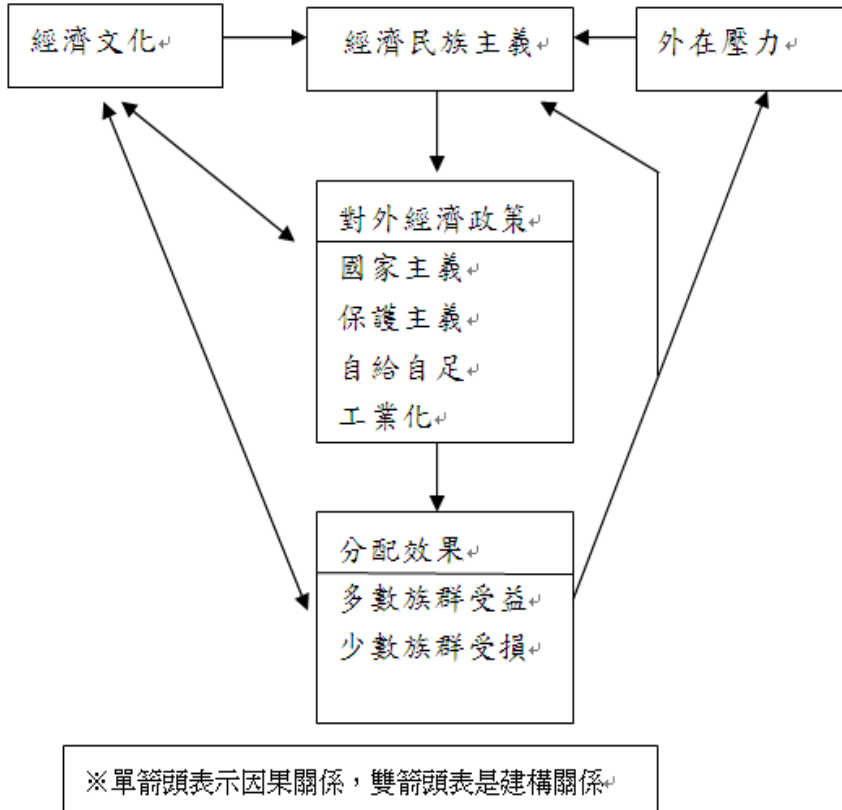
展的經濟對策。而且，Krasner 所關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關注於特定的政策選擇，強調在國家利益引導之下政府政策的長期一致性。經濟民族主義則是關注於特定的政策對象，是在強調在特定情境下用經濟政策來創造自我。更重要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政策選擇具有鮮明的國內分配效果，且此一分配宣稱也期待按照種族身分加以實行。

根據對於既存研究成果的反省，本文提出以三個問題組成的經濟民族主義研究架構。第一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對象問題，也就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民族主義會成爲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從而採取抗拒特定對象的經濟政策。基於民族主義之固有特性，其從潛在之反抗思潮成爲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完全是嚴峻的外在環境所造成的生存壓力有以致之。但是，對於外在環境的解讀，卻受到揉雜歷史經驗與價值系統之特定經濟文化所影響，而決定其回應的對象與回應的方式。因此，壓力和文化成爲決定經濟民族主義對象問題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工具問題，也就是民族主義如何影響特定經濟政策的選擇。正如前述，民族主義者面臨國家主義、保護主義、自給自足政策、與工業化四種可能性的選擇，而此一選擇則是外在政經壓力與內在經濟文化交互作用的結果，甚至會有對於不同對象採取不同政策的特殊政策組合。同時，此一交互作用和經濟政策的選擇，不但具有因果關係之特質，也存在相互塑造和相互建構的關係。第三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分配問題，也就是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分配，可能會與既有族群界線相互重疊，如此將難以避免對於經濟政策的族群動員，從而爲前述第二種的政策選擇過程，帶來新的變數，並且延長民族主義在經濟決策過程所具備的主導性地位。以下用圖示，簡單說明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架構。

在此圖示之中，經濟文化和外在壓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促成經濟民族

主義的出現，並決定其針對之外在對象，因此以因果關係之單向箭頭表示。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進而必須在特定對外經濟政策之間進行選擇，其選擇又帶來對於不同族群的利益分配，其呈現的是一連串的因果關係。而不同族群的利益分配效果，又可能帶來新的外在壓力，或影響特定對外經濟政策之選擇，所以皆以單向箭頭表示。然而，經由特定經濟文化的詮釋，可能會讓不同之對外經濟政策呈現不同意義，從而影響民族主義者在對外經濟政策上之選擇。同樣的，通過特定經濟文化的詮釋，不同族群利益分配所代表的意義也有所不同。反過來說，無論是特定政策的選擇，或是其所造成的利益分配效果，作為一種經濟實踐，都有可能強化既有的經濟文化或創造新的經濟文化。換句話說，這兩組變項（經濟文化－對外經濟政策；經濟文化－分配效果）皆存在相互建構關係，因此以雙箭頭標示。

圖：以經濟民族主義為中心的研究架構



柒、結論

自 1972 年 Gilpin 提出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民族主義或現實主義觀點以來，儘管典範之說被廣為接受，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也延伸為美國學派和英國學派之間的辯論，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卻始終相當有限，就算仍存在於一般教科書，卻連其名稱都充滿爭議。經過對即有文獻之重新檢閱，本文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內涵為追求經濟自主，實現國家的經濟自由。要達成此一目

標，有諸多政策可供選擇，包括禁止外國人擁有本國天然資源、禁止外國人持有本國產業、對於已為外國人持有之天然資源或財產進行登記和國有化、關稅保護和補貼及特殊價格政策、限制國民使用本國產品、透過金融管制維持金融收支平衡和提高現金流量、對特定管理階層的族群身分要求、限制或移民或少數族群。也正因為如此，經濟民族主義未必與經濟開放和自由貿易相互對立。相反的，早期經濟民族主義論者如 List 與 Hamilton 並未排斥自由貿易，採行自由貿易與國際通用的貨幣制度，更被視為是發展國家經濟與壯大國家權力的工具。

作為一種研究途徑，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是條件問題，也就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民族主義會成為影響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導致對外保護主義和對內的經濟歧視政策？而甚麼條件下此一因素會促進對外的自由貿易和對內的經濟平等政策？對此問題，學者的研究呈現兩種不同的回答方式。第一是實證主義的因果關係研究途徑，也就是從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個人層次的因素，來看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形成條件。第二種則是後實證主義的建構關係研究途徑，也就是從歷史與文化的反省，來看民族認同和經濟政策相互建構的過程。藉由對此二方面文獻的檢討，本文提出經濟民族主義的三個次級問題，分別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對象問題、工具問題、和分配問題，從外在壓力和經濟文化的互動，來解釋民族主義者如何選擇其對象、如何選擇政策工具、以及其分配效果如何回饋於對象和工具的選擇。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架構仍無法避免不夠具體，並且缺乏足夠的經驗證據支持。要強化其理論基礎，仍有待於更多歷史個案加以運用和分析，這也將是經濟民族主義能否在國際政治經濟學典範與學派辯論之中另立山頭的關鍵。

參考書目

左正東、楊道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與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合辦，2008年5月1日）

Abdelal, Rawi,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Aron, Raymond,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Ayal, Eliezer.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Organization*, Vol.25, No.3 (1966), pp.230-239.

Breton, Albert. "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2, No. 4 (August 1964), pp. 376-386.

Burnell, Peter,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Cohen, Benjam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ohen, Benjami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 (May 2007), pp.197-219.

Cox, Robert W.,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June 1981) pp. 126-155.

- Cox, Robert W.,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rane, George, "Economic nationalism: Bringing the Nation Back In,"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1(March 1998), pp. 55-75.
- Dent, Christopher,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 Dickins, Amanda,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3(May 2006), pp. 479-492.
- Feiler, Arthur, "Economic Nationalis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80(July 1935), pp. 203-206.
- Frieden, Jeffrey A. and Lake, David 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3rd edit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Gilpin, Robert,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1(Winter 1975), pp. 37-60.
- Gilpin, Robert,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Greenfield, Liah,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regory, Theodor. "Economic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1939)*, Vol. 10, No. 3(1931), pp. 289-306.

Heilperin, Michael, *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 (Genève: Librairie E. Droz, 1962).

Helleiner, Eric,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3 (September 2002), pp. 307-329.

Hayak, Friedrich, *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London: Longmans, 1937)

Harlen, Margerum, "A reappraisal of classica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4 (December 1999), pp. 733-744.

Hieronymi, Otto,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Otto Hieronymi eds.,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James, F. Cyri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Wa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75 (September 1934), p. 66.

Johnson, Harry,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0, No. 2 (June 1965), pp. 169-185.

Kaiser, Karl, "Transnationale Politik: Zu einer Theorie der Multinationalen Politik,"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Sonderheft, Nr. 1* (1969), S. 80-109.

-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O. Keohane, and Krasner, Stephen 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 (Autumn 1998), pp. 645-670.
- Krasner, Stephen,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Keohane, Robert O. and Nye, Joseph 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Keohane, Robert and Nye, Joseph,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Autumn 1987), p. 725.
- Kofman, Jan.,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 Kurki, Kristian eds., *The Great Regression: Financial Crises in an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Helsinki: Fi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 Lake, Davi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vi-Faur, David, “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3 (July 1997), pp.
359-370.
- List, Friedrich,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 Sampson S. Lloyd (London: Longmans, 1992).
- Murphy, Craig and Tooze, Rog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 Menderhausen, Horst., “Transnational Society v.s. State Sovereignty,” *Kyklos*, Vol. 22, No. 2(May 1969), pp. 251- 275.
- Moffat, James,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No.4, (August 1928) pp. 417-446
- Murphy, Craig and Nelson, Dougl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October 2001), pp. 393-412.
- Maliniak, Daniel,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Bridge Too Far or a Bridge to Nowhere?” presented for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Stanford: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d Area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November 9-10, 2007).
- Nakano, Takeshi, “Theorising Econom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0, No. 3(July 2004), pp. 211-229.
- Ostry, Sylvia and Nelson, Richard R., *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 Oshima, Keichi,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Otto Hieronymi eds.,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 Pickel, Andreas, “Explaining, and Explaining with Econom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9, No. 1(January 2003), pp. 105-127.

Pasvolsky, Leo. *Economic nationalism of the Danubian states*. (New York: Allen & Unwin, 1928)

Rosenau, James,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New York: Free Press,1969).

Rappard, William,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W. E. Rappard eds.,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Ravenhill, J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uggie, John,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Spring 1982), pp. 382-385.

Sayre, Francis, "The Menac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2 (January 1935), pp. 82-90.

Strange, Sus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 (April 1970), pp. 304-315.

Smith, J. Gregory,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45, No. 180(Dcember 1935), pp. 619-648.

Shulman, Stephen, "Nation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3(September 2000), pp. 365-390.

Schrecker, Charles, "The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3, No. 2

(March-April 1934), pp. 208-225.

Underhill, Geoffrey R. D.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October 2000), pp. 805-824.

Wegener, Edward,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trans. by Henning Wegener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5).

Paradigms in IPE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Revisited

Tso, Chen-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Economic Nationalism has been seen as one of the three paradigms in IPE alongside with Liberalism and Marxism. In contrast to Liberalism and Marxism, however, Economic Nationalism has seen very little research done within its theoretical domain. In order to narrow this gap in IPE scholarship and to follow up on a recent trend of growing scholarly attention on this subject,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literature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xplores possible analytical approaches. By doing so, this paper realizes that the core assertio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s to secure economic autonomy, which refutes the dichotomy between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argues that a variety of economic policies are compatible with this assertion. The defining natur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s nation-building through economic polic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research on economic nationalism, one being a positivist causal study and the other a post-positivist constitutive study. In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pproache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integral analytic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three aspects of problematique: targets, instruments, and distribution as a tentative conclusion.

Keywords

economic nationalism, IPE, paradigm, ideology